

全球对话

GLOBAL DIALOGUE

6.2

一年出版4期，以16种语言刊出

找回W.E.B. Du Bois

Aldon Morris

社会运动研究的
多元主义

Donatella della Porta

阿拉伯世界的
社会学

Sari Hanafi

中东的政治

- > 黎巴嫩的垃圾危机
- > 常态化极端暴力
- > 保护平民

共产主义后的社会学

- > 在不人性的世界中保有人性

奥地利ISA论坛

- > 迈向在地，迈向世界
- > 奥地利专题

特辑

- > 社会学和气候变迁
- > 印度的自由和暴力
- > 研究写作
- > 介绍哈萨克团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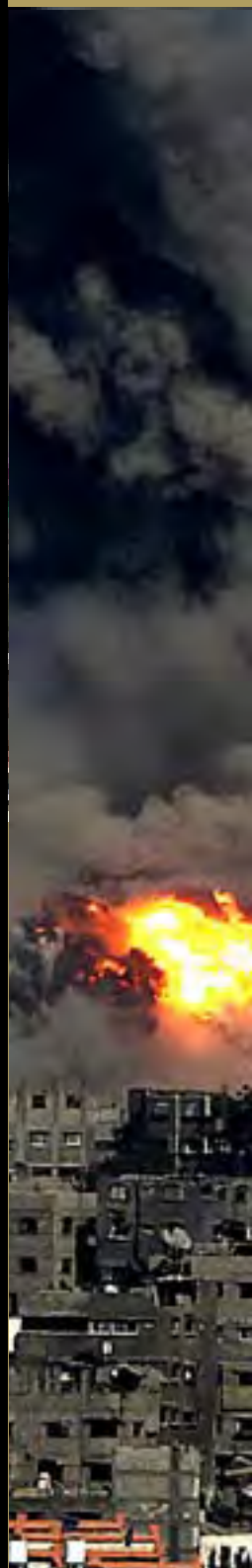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6卷 / 第2期 / 2016. 6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

GD



> 主编的话

邊緣來的社會學

最有创意的社会学通常来自学术界的边缘，而且有时候甚至是来自学科之外。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 W.E.B. Du Bois。Du Bois 可能是美国社会学家中最重要的一号人物，其影响力遍及全球。Aldon Morris 的新書：《The Scholar Denied》就是紀錄 Du Bois 的历史。Morris 说明了这位在德国和 Harvard 接受训练的非裔美国社会学家建立了亚特兰大学派，其科学和严谨的程度远胜于空洞的芝加哥学派。若不是学术界普遍在着种族主义的话，Du Bois 会被认为是美国社会学的创立者。但是因为他不被学术界承认，他只好成为的编辑和评论家，并写出了最重要的关于种族和阶级的书，以及关于种族主义的主体经验，泛非洲主义，以及美国帝国主义。

这期我们也有来自其他边缘的社会学代表。Dmitri Shalin 討論 Vladimir Yadov 的勇氣與正直如何和蘇聯政權交手，以及對後蘇聯時期的社會願景。Sari Hanafi 接受了 Mohammed El Idrissi 的訪談。Hanafi 成长于叙利亚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后来到法国取得博士学位，并在 Cairo 和 Ramallah 待了很久，直到 Beirut 才定了下来，并且成立和编辑阿拉伯的社会学期刊：Idafat。他无惧于批判政府，把中东的社会学带入了一股活力与能量。

Nisrine Chaer 精辟地分析了黎巴嫩的垃圾危机和相关的社会运动。Lisa Hajjar 和 Amitai Etzioni 辯論以色列對於黎巴嫩平民的實際和潛在暴力是否具有正當性。

最后是关于国家学会的报导。这期有一系列关于奥地利的文章，包括简介将在 2016 年 7 月 10-14 日于 Vienna 举办的第三届 ISA 论坛，还有四篇由奥地利社会学家写的研究短文。美国的 Riley Dunlap 和 Robert Brulle 則總結了其令人印象深刻的關於美國社會學會氣候變遷專案小組的報導。此外，還有 ISA 执行委员会和印度社会学家发表的声明，主要是批评印度学术界的言论自由遭受到的戕害。澳大利亚的 Raewyn Connell 則寫了一篇其教導年輕社會學者寫作的心得。最後，我們則介紹哈薩克的編輯團隊，他們是全球對話編輯翻譯計畫的成員。

全球對話以 16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http://isa-berkeley.org)。

投稿請寄給 burawoy@berkeley.edu



Aldon Morris, 杰出的美国社会学家，讨论非裔美国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 W. E. B. Du Bois 如何是美国社会学的建立者。



Donatella della Porta, 意大利社会学家，讨论她如何成为一位知名的社会运动研究者。



Sari Hanafi, ISA 副會長，阿拉伯社會學期刊主編，談論阿拉伯社會學面對的挑戰。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出版社提供赞助。

> 编辑团队

主编:	Michael Burawoy.
执行主编:	Gay Seidman.
副主编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編輯顧問:	Margaret Abraham, Markus Schulz, Sari Hanafi,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Rosemary Barbaret, Izabela Barlinska, Dilek Cindoğlu, Filomin Gutierrez, John Holmwood, Guillermina Jasso, Kalpana Kannabiran, Marina Kurkchian, Simon Mapadimeng, Abdul-mumin Sa'ad,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Sawako Shirahase, Grazyna Skapska, Evangelia Tastsoglou,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区域编辑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阿根廷:	Juan Ignacio Piovani, Pilar Pi Puig, Martín Urtasun.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Benno Alves, Julio Davies.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Jyoti Sidana, Pragma Sharma, Nidhi Bansal, Pankaj Bhatnagar.
印度尼西亚: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a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伊朗:	Reyhaneh Javadi, Abdolkarim Bastani, Niayesh Dolati, Vahid Lenjanzade.
日本:	Satomi Yamamoto, Amame Hisada, Takashi Kitahara, Takehiro Kitagawa, Satoshi Manabe, Tomomi Ohashira, Yutaro Shimokawa, Masaki Yokota.
哈萨克:	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Gani Madi, Almash Tlespayeva, Almas Rakhimbayev, Amangeldi Kurmetuly.
波兰:	Jakub Barszczewski, Krzysztof Gubański, Justyna Kościńska, Kamil Lipiński,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Zajac, Adam Müller, Zofia Penza, Teresa Teleżyńska, Justyna Zielińska, Jacek Zych.
罗马尼亚:	Cosima Rughiniș, Corina Brăgaru, Adriana Bondor, Alexandra Ciocănel, Ana-Maria Ilieș, Ruxandra Iordache, Mihai-Bogdan Marian, Ramona Marinache, Anca Mihai, Oana-Elena Negrea, Ion Daniel Popa, Diana Tihan, Carmen Voinea.
俄国: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Asja Voronkova, Lyubov' Chernyshova, Anastasija Golovneva.
台湾:	何經懋
土耳其:	Gül Çorbacioğlu, Irmak Evren.
媒体顾问	Gustavo Taniguti.
编辑顾问:	Ana Villarreal.

> 本期内容

主编的话: 边缘来的社会学	2
> 社会学作为志业	
找回W.E.B. Du Bois	
by Aldon Morris, 美国	4
社会运动研究的多元主义	
by Donatella della Porta, 意大利	7
> 中东的社会学和政治	
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学: 访谈Sari Hanafi	
by Mohammed El Idrissi, 摩洛哥	9
黎巴嫩垃圾危机的生命政治	
by Nisrine Chaer, 荷兰	12
常态化极端暴力: 以色列的个案	
by Lisa Hajjar, 美国	14
保护人民: 回应Hajjar	
by Amitai Etzioni, 美国	18
> 共产主义下的社会学	
在不人性的世界中当人: 纪念Vladimir Yadov	
by Dmitri N. Shalin, 美国	20
> 奥地利社会学论坛	
凝视在地, 面向世界	
by Brigitte Aulenbacher, Rudolf Richter, and Ida Seljeskog, 奥地利	23
不平等、贫穷、繁荣	
by Cornelia Dlabaja, Julia Hofmann, and Alban Knecht, 奥地利	26
社会不平等、难民、「欧洲梦」	
by Ruth Abramowski, Benjamin Gröschl, Alan Schink, Désirée Wilke, 奥地利	27
性别平等和奥地利大学	
by Kristina Binner and Susanne Kink, 奥地利	29
工作时间和追求更好的生活	
by Carina Altreiter, Franz Astleithner, and Theresa Fibich, 奥地利	30
> 特别论坛	
社会学和环境变迁	
by Riley E. Dunlap and Robert J. Brulle, 美国	31
印度的自由和暴力	
by ISA 执行委员会	33
研究写作: 逻辑和实务	
by Raewyn Connell, 澳洲	35
哈萨克编辑团队	
by 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Gani Madi, 哈萨克	37



> 找回 W.E.B. Du Bois

by Aldon Morr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Evanston, 美國



Aldon Morris.

Aldon Morris 的社会运动研究新典范是相当有名的，特别是他得奖的著作《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这本书强调了社会抗议的组织和文化基础。在这篇文章中，他将介绍他被大家期待已久的新书《The Scholar Denie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这本书描述了美国社会学的早年历史，芝加哥学派的影响，以及亚特兰大学派的边缘化。两位分别的代表人物是 Robert Park 和非裔的 W.E.B. Du Bois。Morris 呈现了 Du Bois 的亚特兰大学派如何和芝加哥学派分庭抗礼，但是却不知名。社会学专业内部的种族主义形塑了芝加哥学派的兴起和影响了整个社会学的演变。讽刺的是，今天，Du Bois 仍然是社会学内外的启发性人物，而 Robert Park 则早已被遗忘。以成就来说，W.E.B. Du Bois 应该被看成是美国社会学的创建者。

W.E.B. Du Bois 是二十世纪的非裔美国历史学者、小说家、诗人、公共知识分子、记者、运动者 / 领导者、社会学家。在所有这些身份之中，Du Bois 最鲜为人知的就是作为一位先驱的社会学者。然而，他总是被认为是一位激进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且因为他和保守的非裔美国人领袖 Booker T. Washington 的意识形态斗争，而成为非裔美国人的领袖。

然而在我的《The Scholar Denied: W. E. B. Du Boi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ociology》一书中，我认为 Du Bois 发展了美国的第一个社会学的科学学派，也就是 Du Boise 亚特兰大学派。该学派在二十世纪的最初 20 年是相

当蓬勃的。其在亚特兰大大学发展起来（现在则是 Clark Atlanta 大学，是一所小型、不富裕的黑人大学），其成员包括了黑人学者，大学生，研究生，以及小区领袖。该学派诞生于精英学术界的边缘，集结了专业和业余的研究者，其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让这个弱势的社群兴起了科学的取径去研究社会。

Du Bois 的专业是具有反叛性格的，因为其从反霸权的种族和社会不平等分析中兴起。在那个时代，社会达尔文主义被用来证成种族隔离和欧洲殖民，并且是社会学的主流观点，然后提供了欧洲和美洲的白人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种族主义在社会和自然科学中是个共识，

认为黑人是生物上列等的人种。Du Bois 作为社会学家则开始去否认种族不平等是生物特征所造成之结果的说法。他宣称种族不平等是源自于歧视和压迫。在他的《Philadelphia Negro》一书中 (1899) 继续了类似的研究, 其经验证据提供了反驳“科学”种族主义的论述。

《The Scholar Denied》一书纪录了 Du Bois 对成立研究团队亚特兰大社会学研究室以及形成反叛社会学的历史。和主流社会学不同的是, Du Bois 的学派采用了多重的方法取径, 使用量化和质化方法去推翻黑人劣等论。该学派的创新之处在于用其数据收集的方式是被重要的理论计划所引导的, 那就是找出种族不平等的科学根源, 然后推翻主流的社会学说法: 黑人天生就劣等。

从这些追求科学知识的努力开始, Du Bois 和其同事开始去找出更广泛的理论贡献, 论证肤色一长期的白人至上主义造成的社会结构以及被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所支撑一导致了二十世纪初期的种族阶层化。以这个观点, 种族是一种社会建构, 不是生物类别。在早期的二十世纪, 美国社会学家用社会生物学的观点去解释社会现实。相反地, Du Bois 使用结构分析, 但也承认能动性影响的社会结构, 并且可能转变之。此外, Du Bois 强调若要解释社会不平等, 社会学家必须检视阶级、种族、性别的相互影响。因此, 对人类解放的追求必须包同时推翻阶级和种族压迫。

在他早期的著作中, Du Bois 发展出了一个“双重意识”的概念, 把“自我”理论化成是一种人类互动和对话的社会产物, 同时也被种族和权力所形塑。关于后者, Du Bois 论证现代性是在非洲奴隶的交易和奴隶制度上所建立起来的, 让劳动力和商品可让西方布尔乔亚阶级所剥削, 然后建立资本主义。

美国社会学长期以来就把其科学的传统追溯到芝加哥大学, 据说是那里白得发亮的教授们发展出了科学的美国社会学, 然后才传播到期他的白人精英大学去的。但是《The Scholar Denied》这本书动摇这种神话般的叙事, 呈现了 Du Bois 的亚特兰大学派怎么早于芝加哥 20 多年的时间就发展出了科学社会学。虽然是 Du Bois 发展出了科学取径, 但是美国的白人社会学家因为学派的激进想法而倍感威胁, 特别是种族的非生物论点, 所以动用了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力量去压制 Du Bois 的观点将近一个世纪之久。我的书强调了 Du Bois 学派的知识其实是优于芝加哥学派和其他白人先驱的。可是, 虽说其想法已经融入主流社会学典范, 但整个 20 世纪都不见 Du Bois 的贡献的讨论, 并且大家还是把功劳归给白人社会学家。

Du Bois 的亚特兰大学派那时必须克服极大

的困难。白人社会学家地位是被工业领袖所支持的, 因为所谓的“客观科学”是具有正当性的。但是 Du Bois 却在著名的大学中被拒绝教授的身份, 并且没有资源做研究。在他的很穷的黑人大学中, Du Bois 领很少很少的薪水, 没有研究费, 其激进的想法被监视, 且被主流的出版刊物所拒绝。

《The Scholar Denied》一书描述了 Du Bois 的学派如何发展了一种本土的社会学典范, 挑战科学的种族主义。他把他的学派扎根在黑人大学里面, 在那里用很有限的资源去发展。那些学者、学生、小区领袖等也只领很微薄的薪水去从事研究, 有些甚至是志愿者。他们和 Du Bois 一起认为科学可以用来抵抗白人至上主义, 希望其研究可以带来自由和解放。

Du Bois 学派利用解放的资本去建立一个本土的社会学。有了小区的支持, 该学派是一个 Burawoy 所说的具有“公共社会学的镶嵌自主性, 让 Du Bois 和其同事可以建立一个特殊的社会学, 一个比芝加哥学派更科学的社会学, 并且仍然保有历史哲学的思想上的影响, 而且对于现状更加有批判力”。

亚特兰大学派并非凭空发生的。相反地, 那是一个贴近社会的公共社会学, 试图去根除国家和全球的不平等。早在 1900 年, Du Bois 开始组织泛非洲大会, 聚集全世界非洲裔的领袖及学者去检视如何可以推翻 Jim Crow 法 (美国南方合法化种族隔离的法律) 和殖民体制。在家乡, Du Bois 帮助组织了 Niagara 运动和美国有色人种权利协会 (NAACP), 两者都是对抗白人至上主义的。他成立了杂志 The Crisis, 分析性别和阶级的压迫, 还有战争。Du Bois 的一生是现状的强力批判者, 总是试图要去找那些阻碍人类自由的社会结构和文化。

像是 Michael Burawoy 所论证的, 社会学若要与社切身相关, 那就必须回到其批判的根源。批判地分析权力和人类宰制可以在本土社会学, 后殖民社会学, 南方理论等中找到。甚至在西方布尔乔亚社会学中向权力说真话的传统也可以找到。Du Bois 学派提供了 Burawoy 所说的“挑战主流观点的实用主义先驱”, 这是一个很常常因为被边缘化而被忽略的贡献。The Scholar Denied 描述了社会学知识如何必须是政治的、介入的、严谨的, 特别是在公共辩论中更是需要如此。的确, 贱民社会学必须比那些维护现状的知识更严谨, 那是因为这是至关重要的志业。社会学现在仍然忽视了 Du Bois 的重要, 因为大家认为他只是“黑人经验科学”或是处理“黑人议题”而已。但是这种看法大大窄化了 Du Bois 的洞见, 他不仅对黑人的研究有贡献, 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也是。我书中所提供的证据可以推翻那些短视狭隘的看法, 因为我把 Du Bois 和他

的学派视为典范，和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并驾齐驱，让社会学可以接上亚特兰大的传统，并且拓展社会学的想象。

在该书的结尾，我讨论了 Du Bois 学派对于社会学的贡献的反思。若一个学派可以在一个最惨的时代、恐怖私刑的年代、歧视根深蒂固的社会中扎根，那么或许这就是一个希望，一个让那些致力生产可以了解和解放人性之知识的人的希望。■

来信寄给 Aldon Morris <amorris@northwestern.edu>

> 社会运动研究的多元主义

by Donatella della Porta,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Florence, 義大利



Donatella della Porta.

Donatella della Porta 是國際知名的社會運動學者，她的著作遍及許多國家，特別是歐洲和拉丁美洲，並且連結了許多領域，像是社會學和政治科學。她支持方法的多元主義，並且是 38 本書的作者。她最近的研究涵蓋了政治社會學里面的許多領域，從政治暴力（《Clandestine Political Violence》，2013），抗議的規則（《Can Democracy be Saved?》2013），政治腐敗（《The Hidden Order of Corruption written with Alberto Vannucci》，2012），社會運動和民主的關係（《Mobilizing for Democracy》，2014），到對於新自由主義的回應（《Social Movements in Times of Austerity》，2015）。她長期以來也投入培育不同國家的年輕學者，到了她成為 Florence 之 Normale Superiore 的社會人文研究院院長之後還是持續這樣工作。她也是 Cosmos 的社會運動研究中心的主任。接下來的文章中，她將闡述其對於社會運動研究的願景和信念。

我的對於社會運動的興趣是從幾個不同的路徑集結而形成的。核心的部份就是對於抗議的高度興趣，這連結到了我學運時期的經驗，以及在投入了相當多的時間和資源之後卻收穫不多的這種挫折感所來。然而，也有些偶然，但對於許多學者的生涯卻又是必然。我想我對於研究領域的投入是偶然的，是一次在我問了發表過很多關於依賴社會的 Alain Touraine 當我在 Paris 的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碩士論文指導老師之後才決定的。他很欣然答應，但說他的興趣轉向了社會運動，然後我就想說，好啊，為什麼不呢？

許多其他的偶然機會也把我帶進了一個正在成長中的學者網絡之中，這些學者正在尋找一個可以解釋社會運動的新典範，這些人中包括了 Sidney Tarrow，他給了我第一篇關於社會運動的文章很有用的評語，也變成了我的導師和好友。在 European 大學撰寫博士論文不僅讓我磨練了我的語言，也體驗了其他的文化。我那邊有許多的導師，像是 Philippe Schmitter 和 Alessandro Pizzorno，他們滋養了我的好奇心，然我跨越了學科的邊界，博士畢業之後，意大利的學術的裙帶主義把我推向了國外，那是刺激的經驗，把遷徙的負面經驗轉化成了正面的“根深蒂固的普世主義”。這些幸運的偶然也給了我和其他年輕學者合作的机会，建立了研究的網絡與中心，包括成立了社會運動研究中心 (Cosmos)，現在則位於意大利 Florence 的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當我在思考研究和教學的主題的時候，我都是以社會運動研究為主，原因有很多，包括認知的、情感的、關係的。第一，我發現多數的社會運動研究者人都很好，多半是為了改善世界且出自於真誠的興趣。他們社會的政治信念和經驗總是被主流的學者所批評，但是我卻發現他們在該領域中的成果更加豐富，並且形成了一股很好的研究氛圍。此外，政治環境也決定了理

论的创新，在政治场域中，若是被认为边缘且有问题的非典型的政治不断出现，且挑战的抗议一波接着一波，那么这种抗议就导致对于“另类政治”越来越高的接受程度，超越了所谓常态的议会政治。

这个对于政治的广泛定义也解释了为什么社会运动研究会有跨领域的丰富理论成果。这个领域侍从连结多个学科取径中浮现的，从象征互动论到组织社会学，从社会理论到政治科学，社运研究学者建构了概念和假设的工具箱，借着结合从不同学科而来的知识而得以可能。这个趋势也随着时间更加扩大，从社会学到政治学，延伸到地理学、历史、人类学、规范理论、法律、经济学，而每个抗争政治的新周期也带进了新的学者到这个领域里面。

我所珍惜和也希望有所贡献的就是对于经验研究的正面态度。社运研究的多元理论和方法论典范是其特点。社运研究者应用了许多不同的方法，把质化和量化方法结合在一起，虽然对于某些特定的方法有着批判和自我批判（从个案研究到量化的事件分析），但是还未曾有过方法论的战争发生过，而方法的多元论也是这个领域的共识。但是在其他社会科学的次领域中会发现实证主义和诠释主义的认识论分野，或是本体论假设上的争论，而社运研究中则倾向更细致的观点，即使倾向实证主义的学者也承认了概念建构的重要性，和建构主义者也没有屏弃互为主体知识的追求。许多社会研究结构了结构和认知（例如，政治机会和框架理论），认为他们是结合在一起的。相似地，许多研究者结合了对于普世法则的怀疑论和超越案研究之经验描述的渴望。

这种包容的视野也引起多领域的丰富激荡，并且想要建立一个知识的体系。归纳和演绎的取径被结合在一起，质化和量化也是。混合方法也被广泛应用。事实上，社运研究已经对于不同收集资料和分析的方法相当实用主义，虽然有些学者对于社会科学必须中立这点相当坚持，或是有些学者对于社会科学必须中立这点相当坚持，认为研究应该从属于政治宣言，但是在学术之中的政治化程度则透了规范和伦理的辩论而有所讨论。

这其中有许多对于新颖的理论多元论所作的解释。当然，我们究没有究计划像是究计划也产选举研究或是社会阶层化那样有固定的数据库，但是学者也用了许多方法去搜集资料。不过很少的社运组织会留下档案甚至是名册就是。无论如何，把新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引进，

或是创新，这帮助了经验研究的茁壮。这也形成了一股规范性力量要去开创不只是针对学术理论而且要导向社会创新的知识。合作的研究计划也产生了新的方法论反省。

但是即使有这些正向的发展，这样的成功可能也是阻碍。特别是当过去几十年来的研究蓬勃发展集中在全球北方，但是却不适用南方的经验。这种迈向社会科学国际化的潮流是正面的，特别是在国际化被理解为不同国家的经验，学术制度，文化。国际化可以让我们知道不同的取径、方法、风格、实做，把经验放在比较的脉络下来检视。但是，对于特别传统的国际化则可能是有问题的。我有幸可以和来自 35 个不同国家的博士学生汉学者合作，我学到了很多，并且超越了主流昂革鲁萨克逊典范。我想我的希望来自于那些年轻的学者，我对于这个高度反身的领域有着很乐观的期待。■

來信寄給 Donatella della Porta <donatella.dellaporta@sns.it>

> 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学

访谈Sari Hanafi



| Sari Hanafi.

Sari Hanafi 是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的社会学、人类学、媒体研究的系主任和教授。他是 Idafat: the Arab Journal of Sociology (阿拉伯文) 的编辑, ISA 副会长, 以及阿拉伯社会科学委员会的副会长。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了迁徙社会学、科学研究的政治、公民社会、精英形成、转型正义。他最近的书是《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he Arab World: The Impossible Promise》, 这是和 R. Arvanitis 合着, 并以阿拉伯语和英语出版。很少人有像 Sari Hanafi 对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学以及在西方社会学和阿拉伯社会学之间搭起桥梁贡献这么多的。这篇访谈是由摩洛哥的 El Jadida 大学社会学教授 Mohammed El Idrissi 所执行的。

MEI: 你在 Damascus 的 Yarmouk 难民营中长大, 并且一开始是念土木工程的。你的社会背景怎么让你作出了这项转变?

SH: 是的, 的确! 在 1980 年代早期我可是非常热衷政治的, 我那时候想要改变世界! 当然, 我现在会认为可能都不太了解世界了, 怎么改变。不过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有两个议题是最重要的: 巴勒斯坦的被殖民和叙利亚的威权主义。这两个议题让我转向社会学。我在 Damascus 的难民营时候, 在 Day of Land 的那天抗议但被逮捕了。一个特务警察跟我说: “你的团队会被载去监狱!” 阿拉伯的威权主义总是低估了这群“巴士人民”的重要性, 不论他们被描述成异议知识分子或是中产阶级, 他们都是很重要的。我后来迷上的 Foucault 的对于权力和生命政治的分析, 到法国去深造。我想要用科学的方式去分析国

家精英，但同时我的行动主义也帮我理解了社会学不只是专业和批判的一门学问，用 Burawoy 的分类而言，还同时包括了政策和公共面向。

MEI：结合专业和公共社会学这点，挑战为何？

SH：在阿拉伯世界这不是简单的是。社会学就像其他的社会科学，在阿拉伯世界并数一种武术，像是 Pierre Bourdieu 所说的要让人的常识和意识型态卸去，而是国家现代化计划的工具。有两股力量想要去正当化社会科学：威权政治精英和意识形态团体。两者都强调的社会科学有问题的根源（从殖民时期诞生的学问）和外国的资金援助。现在我相信问题不只是来自宗教团体，还包括了阿拉伯的“非自由派”左翼。两者都轻视阿拉伯世界发生的变化和反对普世民主价值。当然，阿拉伯之春揭露了一些正面的知识发展，但是社会科学的影响还是很有限。我想突尼西亚势力外，因为那里的科学扮演了公民社会对话的很重要角色。2015 的诺贝尔奖给了 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 是个很重要的象征胜利。

MEI：在阿拉伯后起义时代，社会学有对这样正面认知发展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吗？

SH：这里许多后殖民的研究太简化了，无法理解阿拉伯世界的变化。许多起义你会看到都失败收场，这不只是因为帝国主义和后殖民的霸权，而是深植的威权主义缘故，以及公共信任的缺乏，因为人民也正在学习多元、民主、自由、正义而已。阿拉伯世界需要社会学的工具去理解社会运动，按照 by Asef Bayat 所描述的，就是沉默、长期但是持续的人民去介入政治，为的是改善社会。

我认为，公共社会学总是要去挑起关于社会行动者改变社会的能力这种讨论的可能。作为社会学家，我的角色逝去让大家知道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绝对的恶或是善。社会学想象和对行动者的关注提醒了我们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换句话说，社会学提醒公众去思考人民的努力、超越既有地缘政治的解释（x 和 y 国家以战争来反对），也超越族群团体之间的纷争（这也是许多学者和媒体在所理解的叙利亚或是巴林的冲突）。社会学也提醒我们从共同利益的角度，而非区分类别的角度（反抗 vs 帝国）去分析事情。部只有 ISIS 使用叛教的控诉（takfir）去形成牺牲者祭品（homo sacer），而是也包括了那些像平民扔掷炸弹的国家。社会学提醒我们年轻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阅读了某些对于可兰经的诠释就加入了 ISIS，而是因为他们住在了被排挤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之中。

MEI：公共社会学在阿拉伯世界扮演了什么角

色？

SH：阿拉伯世界还有待去承认社会科学在理性化社会辩论和提供现代性问题解决之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阿拉伯地区，你很少会听到由政府要求社会科学家撰写的“白皮书”，即使当突尼西亚的独裁者 Zein Al-Dine Ben Ali 使用科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武器在 1990 年代对付其伊斯兰教徒，他并不是指社会科学，而是硬科学。科学会议就像其他会议一样，是被政府监视的。同时，社会学家无法自助，没办法建立科学社群然后发挥影响力，保护自己的批判声音。

MEI：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该地区的科学社群那么弱？

SH：这需要两个过程去强化科学社群。第一，这个专业必须要有地位，但是地位必须透过国家学会去制度化。这两者在阿拉伯世界都是付诸阙如的。譬如现在只有三个社会学会（黎巴嫩、突尼西亚、摩洛哥），而且有趣的是，这些国家中的政府介入是较其他阿拉伯世界要少的。近来，新成立的阿拉伯社会科学委员会已经开始讨论其怎么可以让专业学会更加茁壮的议题了。

像我之前所说的，科学社群应该组织起来去面对不仅仅是国家的介入，还有像要把社会科学去正当化的那些意图。宗教团体总是认为会被社会科学所威胁，所以两者在竞争公共领域的论述代表性。一有次我看了一场电视辩论，是由宗教领袖和社运者的辩论，Sheikh Mohamed Said Ramadan al-Bouti（认为伊斯兰教反对任何的家庭计划）以及宗教政府的政府支持组织“叙利亚女性总联盟”。当家庭计划的议题在社会学和人口学里面很一般的时候，没有社会学家会把它带到公共论述之中。另一个例子是 Qatar。其政府保护那些国外大学的分部可以教他们原本大学就在教授的课程，但是谁来保护那些教授呢？最近的一个访谈中，Qatar 的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分校校长说，为了“保护自己”，Qatar 政府是有责任的。所以在这个连言论自由都相当有限的地方，发展“科学领域”为领土的例外空间是一条路，因为地方法律不会认为批评外国社会是不妥的，但是这个风险就在社会学会和在地社会脱节。

MEI：作为 ISA 的副会长，你怎么让社会学社群更加国际化？

SH：ISA 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 2014 年的横滨世界大会上我被选为国家学会副会长 4 年。我致力于五点：第一，我鼓励更多的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合作，不论在个人、机构、集体的层次都是。第二，我希望全世界的社会学家，特别是从南美、非洲、中东的社会学家加入 ISA，因为这些地区的会员数仍然不多。第三，我会

>>>

试图去争取资金可以补助来自比较贫穷国家的社会学者出席 ISA 会议（类别 B 和 C）。第四，我会鼓励在那些地区的国家学会成为 ISA 的集体会员。最后，我想让 ISA 支持更多的国家科学社群活动，透过拜访他们的活动，鼓励交流。我觉得我任重道远。■

來信寄給 Sari Hanafi <sh41@aub.edu.lb> 和
Mohammed El Idrissi <mohamed-20x@hotmail.com>

> 黎巴嫩垃圾危机的 生命政治

by Nisrine Chaer, Utrecht University, 荷兰



| Beirut的垃圾山。

在 2015年8月，黎巴嫩的一连串抗议是为了回应所谓的垃圾危机，这后来演变成了一场反贪腐的运动。这个垃圾管理危机其实提供了检视黎巴嫩生命政治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揭露了黎巴嫩国家和宗教政党所导致的阶级和公民身份的暴力。

Beirut的垃圾危机在2015年7月开始，导因于垃圾堆满了街道的脏乱景象让人民无法沈受。政府已经结束了和垃圾处理公司Sukleen的一份长期合约，这个关系被视为是黎巴嫩私有化的一个典型案例，在其中的政府的合约都被政治精英和亲近人士所把持，使得贪腐

盛行。所谓的“你好臭”的运动是由公民社会中产阶级和社群媒体所发起，为了去接触更广大的公众，包括公民组织，学生，左派，反政教合一者，和女性主义者，并且诉诸更广泛的议题：贪腐，裙带主义，公共空间的缺乏，废除政教合一，警察暴力的课责性。

超过70,000的人民参与了8月29日的重要抗议活动。但是转折点发生在一周前，也是“你好臭”运动组织者和抗议者区隔开来的时候。抗议者那开始暴力化，许多被认为是Moundassin——这是帮派和渗透者的阿拉伯语，他们被视为是来卧底破坏的。你好臭运

动甚至要求政府要找出“卧底”的和“清干净街道”，认为这些暴力青年是Amal政党派来的。接下来的几天许多抗议者，主要是左派，挑战你好臭运动，并用“我是Moundass”的标语去谴责Moundass一字的歧视意味。这让运动领导因此声明道歉。

但是这起事件引发了深层的分裂。黎巴嫩媒、政治人物、运动者体对于Moundass的使用再生产了阶级和种族主义的论述，歧视抗议者，并强调他们“不同的外貌”。一份黎巴嫩的报纸称他们为“狗”，其他称为“露胸的男人”、“蒙面的男人”。有些媒体则是逊尼



教派和基督教派的联盟，认为抗议者侍从什叶派的工人阶级区，像是 Khanda' El Ghamik 来的，并连结到真主党。其他则认为抗议者是叙利亚或是巴勒斯坦的难民。

对抗议的回应则是很暴力的。防暴警察用尽手段去控制抗议者的身体，使用暴力去对付从低收入阶级来的、非黎巴嫩背景的人。在黎巴嫩的生命政治系统里面，所谓的 Moundassin 是工人阶级和非公民的主体，是被罪犯化和可以牺牲的，这和特权阶级的身体是才是值得活着看法，大相径庭。

抗议被用有组织的警察暴力所对付。在每一波的逮捕之后，静坐自愿地在监狱前面展开，并且重复着这种不服从。讽刺和幽默得标语批判“渗透”(Indiseis)一字的使用，有些写说“我是 Khanda”(Je suis Khanda)，Khanda 指的是 Moundassin 所住的地区。也有写“我们是 Moundassin”、“# 渗透”、“这是 Indiseis 革命”、“从 Indiseis 来，看我有多软弱”，而其他则嘲笑其实是警察渗透到群众之中。

Moundassin 的这种再声明传散了出来。当 Beirut 的

贸易团体领袖宣称那些抗议者是共产主义者会毁坏经济和国家的文明时候，抗议者把 Beirut 市区转变成 Souk Abou Rakhousa，也就是“cheapo 的市场”，在非法的、私有的、不可取得的、热闹的市区开启了市场，吸引了上千民众前来抗议，开创了新的公共领域。

这场垃圾危机给阶级和公民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呢？黎巴嫩的政治系统让政治精英可以从垃圾管理中获利。这些精英和民众透过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连结在一起，并透过政教合一加强再生产。黎巴嫩的生命政治包括了新自由主义国家和政教合一行动者的共谋，让高级的生命可以被归属到高级的类别，而让底层人民属于上层阶级。

多数的掩埋场都在边缘地带，事实上，Sukleen 的合约结束时，Na'ameh 的居民封路然后进到掩埋场，因为它引起了严重的健康警讯和生态破坏。虽然政府已经承诺要在 2004 年关闭，但是还是持续到了 2015 年。那些住在掩埋场附近的人都暴露在危险的环境之中，显示了阶级和垃圾危机之间的相关性。政府和宗教政党控制了这些人的生命，让他们

慢性死去。

这种警察的暴力和环境的暴力是一种去人性化的图像，象征的黎巴嫩秩序的结构，也持续了好几十年。垃圾危机不仅让政府的贪腐现形，也揭露了阶级和种族的暴力图景是如何镶嵌在政教合一国家和政策之中。■

来信寄给 Nisrine Chaer
<nisrine.chaer@gmail.com>

> 常態化極端暴力

以色列的個案

by Lisa Hajja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美国



2014年7月以色列对加萨轰炸所造成的火势和烟雾。

在 2016 年 2 月 15 日，George Washington 大學的社會學家 Amitai Etzioni 在以色列的 Ha' aretz 發表了一篇社論：“以色列應該使用毀滅性武器對付真主

黨的飛彈嗎？”^{注1}，其文章說，真主黨有十萬枚飛彈，是真正的安全威脅。Etzioni 也引用以色列官員的說法說，多數的飛彈佈署在私人的住宅中，若以色列地面軍隊送去毀滅那些飛

>>

彈，“可能會造成許多以色列的死傷，還有黎巴嫩人的也是。”另外一個他討論的選項是使一用空爆燃燒彈，去“散播被點燃的燃燒雲，造成大規模爆炸，遍及區域內的所有範圍。”他承認即使警告的話，死傷可能在所難免。因此，他認為，因為“以色列可能被迫去使用空爆燃燒武器，”那些外國對以色列有敵意的專家應該回應這些飛彈的威脅，並希望“在沒有其他選項的情況下，使用這武器雖難被接受，但是可以理解的。”

國家有權力去防禦自己的領土，但是武力的使用是被國際人道法（IHL）所規範的。其前言說了，國家是有責任去區別戰士和平民的。國家或許可以部份使用武力去攻擊戰士，並且要達成合理的軍事目標。可是，即使真主黨的飛彈是佈署在民宅之中，那麼使用像是空爆燃燒彈這種武器也是違反的國際的人道法律的。

而在建議外國軍事專家和公共知識分子應該幫助常态化這種使用空爆燃燒彈造成的極端暴力的時候，Etzioni 建議是和以色列對於國際法的態度是一樣的。不像那些屏棄國際法的國家，以色列長期以來就是對國際法有著策略性的詮釋，希望可以把暴力帶進法律條文之中。例如，在2000年，以色列就變成是第一個公開宣稱有權利去允許法律之外的處決為安全政

的選項的國家。前以色列的將軍 Daniel Reisman 所說的，

我們現在這裡看到的是國際法律的重修，也就是說，如果你的正，也就是說，如果你做某些事情做得夠久的話，那麼國際社會就會接受它。整個國際法就變成是今天所禁止的事會變成允許的，只要夠多的國家違反了一項法律^{注2}。

Etzioni 的場景包括了使用空爆燃燒彈，這是以色列最近的軍事衝突的特別發展為基礎的論證，並且政府使用的理由去証成其策略性的使用無差別的毀滅性暴力。在2000年9月，也是第二次官方的稱為“沒有武力衝突的戰爭”開始的時候^{注3}，以色列宣稱那是自我防衛，有權力去使用武力對付“軍事實體”，也就是那些在巴勒斯坦半自治區的約旦河西岸和加薩。在2002年的3月，為了回應哈馬斯的 Netanya 飯店自殺炸彈攻擊，以色列展開了西岸的軍事行動。“防衛網軍事行動”代表了新的策略：“除草”^{注4}，被設計去擴大毀滅的暴力程度，為的是殲滅現有和未來對付以色列的能力。4月9日，在 Jenin 的戰役中（以色列從1982年侵略黎巴嫩以來的最大規模軍事行動），13名以色列軍人喪生，這讓以色列內部產生及大的壓力去完成這項軍事行動，沒有進一步的傷亡。以色列沒

有把戰士送到建築物里面，但是先把建築物包圍，使得巴勒斯坦人被迫要當人肉盾牌去保護軍人^{注5}，同時，地面部隊的使用也被認為比空襲更有正當性。但是都更在策略上比較困難去達成軍事目標，人肉盾牌是一種保護武力的方式，但是2005年的以色列最高法院判定禁止這種方式。

合併起來看，我們看到這些因素促使了策略轉向更大規模的遠距空中暴力。2002年的7月22日，在一個目標為擊斃哈馬斯領導之一的 Salah Shehadeh 的軍事行動中，一架 F-16 投擲了一頓的炸彈到加薩的 al-Daraj 區域，炸彈摧毀了 Shehadeh 所住的地方的8棟建築物，部份摧毀了另外9棟，除了 Shehadeh 和他的保鏢之外，另外14名巴勒斯坦平民，包括8名小孩，都被殺死了，多達150人受傷。群眾的憤怒是針對炸彈的規模以及在住宅區轟炸，要求以色列軍方要展開調查，但是調查結論雖然承認“在可得信息上有所缺失”，可是仍然說該行動是針對恐怖暴力分子的正當目標的攻擊，而那些無辜平民的是在 Shehadeh 所設計的躲藏地點的^{注6}。

所謂“無辜百姓”的修辭和“正當目標”正好預示了以色列的“平民敵人”的詮釋架構去解釋人肉盾牌的策略，這是為了把對於平民的死傷責任轉嫁給那些被鎖定目標的組織上面，

>>

同樣地，以色列的策略偏好是空襲，也被認為是“合乎道德”的選項，這在一篇 2005 年的 Tel Aviv 大學教授同時也是以色列軍事顧問的 Asa Kasher 和 Amos Yadlin 將軍文章中可以看到：

若我们把恐怖份子排除在非战士的类别之外，在战争中最小化死伤人数的责任总是排在最后的，我们坚定拒绝这种看法，因为这是不道德的。一个战士是一位穿着制服的公民。在以色列，一个人常常是一个义务役士兵或是储备军人，而事实上，在恐怖攻击中，那些在恐怖份子附近活动的平民不应该是让战士生命受到危险的理由。^{注 7}

这样的修辞策略是为了要让军队的安全作为最优先选项，优先于平民，并且用战士的“文明化”去包装。这也完全和国际人道法的精神背道而驰，并且没有区别国籍的空间。Grégoire Chamayou 描述這種是“帝國戰士的豁免原則”^{注 8}，认为“整个计划就是为了去让武装冲突的法律有诠释空间，也就是选择性地使用国际法原理好支持自身国家生存的利益”。^{注 9}

在 2005 年，以色列单边地撤出了加萨的军队，封锁了该区域，在 2006 年巴勒斯坦的选举， Hamas 赢了，而在 2007 年之后的战役让巴勒斯坦政权退出了加

萨。这个结果让以色列宣称加萨是被恐怖分子所把持且住的是同情恐怖分子的人的这个论述得到了支持。这个论述认为平民被哈马斯用来当人肉盾牌。^{注 10} 这个论述框架可以用来和以色列对于真主党控制的黎巴嫩地区的说法比较，其把加萨描述成外国、敌意、可攻击的，这似乎隐含了以色列不应该对平民的死伤负责，即使以色列攻击造成的死伤也是。就像 Neve Gordon 和 Nicola Perugini 所說的，“事後詮釋對於[正当化那些杀了很多人的轰炸]是重要的，因为其允许了以涩去宣称暴力是符合国际法的，而且结果会适合呼道德的”。^{注 11}

在以色列 2006 年入侵黎巴嫩的战一中，军队谨慎地布署了不成比例的武力，这是在称之为“Dahiya 教條”的策略下所执行的在 Beirut 南方郊区住了很多什叶派的行动。2008 年 Gadi Eizenkot 將軍同時也是以色列的北方指揮官說：“2006 年在 Dahiya 所发生的将会在其他任何的村庄中发生，我们会采取不成比例的武力去造成大规模的破坏。从我们的管点来说，那些地方不是平民地区，而是军事基地。这不是建议。这是个计划。而且这已经通过了”^{注 12}。这些策略的逻辑在 2008 年 10 月被 Gabi Siboni（一位退休的策略分析家）進一步闡釋：

这个原则是让不成比

例对于敌人弱点的轰炸是主要的战争方向，而摧毁敌人的飞弹发射设施是次要的方向。这样的响应重点的是造成大规模的毁坏需要长期和昂贵的重建成本。而轰炸必须快速，比叙以破坏设施回优先。这样的响应也将会造成长期的技艺，因此增加以色列的吓阻能力，减少敌对国家对于以色列的敌意。^{注 13}

的確，兩個月在這個策略執行之後，以色列發動了“加薩戰爭”。按照聯合國的國際調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軍隊都犯了戰爭罪，以可能違反人道原則。該報告說，以色列鎖定“加薩的整個人口”，無法區辨平民和戰士。以色列攻擊基礎設施的行動是謹慎、系統、策略的。

2014 年的加萨战争则是目前最暴力的一次。“云柱行动”包括了超过 6000 次空袭，发射了 50,000 次的飞弹，这是估计有 21 千吨的炸药威力。武器包括了无人机，阿帕契的地狱火飞弹，F-16 装载了 2000 磅的炸药。^{注 14} 目标则包括了基础设施建设，像是海水淡化厂，电厂，医院，学校，大学，高楼层建筑，购物中心，以及所有有 Hamas 的建筑。这场战争造成了超过 2,100 巴勒斯坦人丧生，11,000 人受伤，而多数是平民。有的是整个家庭灭亡，或是整个小区被铲平。^{注 15}

对于什么是战争中合

>>>

法的诠释是被国家的实践所形塑的，特别是强权国家。以色列使用极端暴力和对于平民免于受到战争迫害的原则的忽略，是会被其他国家所效法的。的确，Etzioni 提議国外军事专家

和公共知识分子应该证成燃烧空爆弹类似武器的使用，这种说法就是在证成极端暴力。这也让我们社会科学家有了扮演某种角色的机会，知道法律和战争的关系，并且遵守国际人道

法的诠释。这个角色包括了要努力发挥我们的专业，继续让不成比例的无差别武器成为是不正当的。■

來信寄給 Lisa Hajjar
<lhajjar@soc.ucsb.edu>

註 1：标题其实改变了两次，見 Ben Norton, "Prominent American Professor Proposes that Israel 'Flatten Beirut' - a 1 million-person city it previously decimated," Salon, February 18, 2016.

註 2：Yotam Feldman and Uri Blau, "Consent and Advise," Haaretz, January 29,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haaretz.com/consent-and-advise-1.269127>.

註 3：見 Asher Maoz, "War and Peace: An Israeli Perspective," Constitutional Forum 14 (2) (Winter 2005): 35-76.

註 4：Efraim Inbar and Eitan Shamir, " 'Mowing the Grass' : Israel' s Strategy for Protracted Intractable Conflict,"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7(1) (2014): 65-90.

註 5：Yael Stein, Human Shields: Use of Palestinian Civilians as Human Shields in Violation of High Court of Justice Order (Jerusalem: B' tselem, 2002).

註 6：IDF Spokesperson, "Findings of the inquiry into the death of Salah Shehadeh," August 2, 2002, available at <http://www.mfa.gov.il/mfa/government/communiques/2002/findings+of+the+inquiry+into+the+death+of+salah+sh.htm>.

註 7：Kashar and Yadlin, "Assassination and Preventive Killing," SAIS Review, 25(1) (Winter-Spring 2005): 50-51.

註 8：Grégoire Chamayou, A Theory of the Drone, trans. Janet Lloyd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15): 130.

註 9：同上，p.134.

註 10：見 Neve Gordon and Nicola Perugini, "The Politics of Human Shielding: On the Resignification of Space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Civilians as Shields in Liberal Wars," Society and Space, 34(1) (2016): 168-187.

註 11：同上

註 12："Israel Warns Hizbullah War Would Invite Destruction," Ynet, October 3, 2008, <http://www.ynetnews.com/> 註 13：Gabi Siboni, "Disproportionate Force: Israel' s Concept of Response in Light of the Second Lebanon War," INSS Insight, 74 (October 2, 2008), <http://www.inss.org.il/index.aspx?id=4538&articleid=1964>.

註 14：Rashid Khalidi, "The Dahiya Doctrine, Proportionality, and War Crime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44(1) (2014-15): 5.

註 15：見 "50 Days of Death and Destruction: Israel' s '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 ," Institute for Middle East Understanding, September 10, 2014, <http://imeu.org/article/50-days-of-death-destruction-israels-operation-protective-edge>.

> 保護民眾

回應Hajjar

by Amitai Etzioni,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美國

Lisa Hajjar 指出了我的社論是要把暴力合法化。為了回應，我會說明我寫那篇社論的動機，然後在有限的篇幅內討論我認為隱藏在表面下的核心議題，以及應該如何處理。

我在 1948-50 的戰爭中目睹了殺戮和死亡，包括了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我也失去了許多親朋好友。這個經驗（我在戰爭中期剛滿 20 歲）讓我認為所有的戰爭，不論是否正當，都是悲劇，都該盡力避免。我寫了兩本書討論怎麼避免核子戰爭（《The Hard Way to Peace and Winning without War》）。我在 Trafalgar Square 反核，而且甚至快要丟掉我在 Columbia 大學的工作。我後來成為第一個反越戰的行動者（這個經驗在《My Brother's Keeper: A Memoir and a Message》）。我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在 Security First 一書中，我以兩個學術研究為基礎，說明伊斯蘭宗教文說道伊斯蘭並不支持暴力。最近，我寫了幾篇文章和社論，警告美國和中國邁向戰爭的危險，並試圖組織中美兩國的知識分子支持雙邊保證相互戒持 (Mutually Assured Restraint)。總之，我人生的多數時間致力於防止暴力的發生。

但很遺憾的是，我還沒有辦法想出一個具體的方法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可以有一個兩國並存的解決辦法，但我強力支持這條出路。我和巴勒斯坦的學者 Shibley Telhami 一起建議，若是我們停止把焦點放在過去的歷史，不要只是想要究責，而去討論我們怎麼可以邁向未來，那麼這種方式是可行的。（一旦我們有兩個國家，那麼就會有足夠時間成立真相委員會去研究過去，^{注1}）而且我指出那片土地是足夠給兩個民族的，而不是像其他人說的要把對方到地中海或是約旦去。^{注2}

現在回到我的社論。Hajjar 相信我的文章

是要把暴力合法化。但我的目的非但不是這樣，還是要去避免流血傷亡。我想不爭的事實是真主黨有約 100,000 枚飛彈，而且是用來攻擊以色列的。他們也從來沒有隱藏他們的目的。真主黨在 2006 年發射飛彈攻擊以色列的時候並沒有遲疑，但是以色列在從黎巴嫩撤軍之後遵守了所有的國際法（當然以色列並沒有權利在一開始攻擊黎巴嫩）。這是聯合國也承認的，而且聯合國很難說是支持以色列的。此外，我相信有證據說多数的真主黨飛彈是布署在民宅之中的，的確我們應該問應該怎麼處理這種情況。

我因此在我的社論文章中說，在那些飛彈還沒有發射之前，我們應該問一個倫理和法律的實際問題：以色列應該怎麼回應這樣的攻擊？這個發問的目的不是要去正當化暴力，而是要防止暴力。若是以色列的軍隊要挨家挨戶去毀滅這些飛彈，那麼兩方都會有相當嚴重的死傷，所以應該要避免。過去我說過，美國曾經攻擊 Tokyo 和 Dresden 的平民，以色列據稱也在 2006 年的 Beirut 做過同樣的事情。我則是反對這種說法。^{注3}我後來說是，兩個美國軍事專家建議高威力的傳統爆炸武器可以被使用，前提是平民有給予足夠的時間去撤離該地區。我承認不論什麼方式，都會造成雙邊的傷害，而這種傷害也是所有的戰爭中都會發生的。這種雙邊的傷害是為什麼我們應該避免戰爭的最主要原因。我文章結尾建議局外人應該去想想若是身處於戰爭中，他們可不可能有更好的方式去吓阻真主黨的飛彈威脅，並且想想若飛彈一旦發射，要怎麼響應？

我不是要去評價那些 Hajjar 所引述的那些官員說法，也不是要評價那些說法可能造成的影響。然而我要指出的是，那不只是一個以色

“目的不是在合法化暴力，而是防止它。”

列议题而已。把这些难题看成是单一国家的议题会导致错误的结论。这是个美国和其中东的盟友都要面对的，而且中东的恐怖分子持续地在违反国际人道法，也就是他们并没有区别战士和平民。他们把弹药藏在清真寺之中，让救护车运送自杀战弹背心，从民宅中狙击，在学校布署武器，然后利用平民当人肉盾牌。

那些搜寻恐怖份子的人基本上有两个作法，不是让死亡人数继续增加且被 ISIS 占领改地且屠杀人民，就是不分战士和平民去攻击且造成许多人死亡。这两者都是不能被接受的。我的社论文章目的是要让读者去想想这种道德难题该怎么处理，这点也是 Hajjar 的文章完全没有提及的。■

來信寄給 Amitai Etzioni <amitai.etzioni@gmail.com>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17, 2002

註 2：Etzioni, A. “Israel and Palestine: There’s Still Room at the In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pril 9, 2014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israel-palestine-theres-still-room-the-inn-10212>.

註 3：Etzioni, A. “Should Israel Consider Using Devastating Weapons Against Hezbollah Missiles?” Haaretz, February 15, 2016 <http://www.haaretz.com/opinion/premium-1.703486>.

註 1：Etzioni, A. and Telhami, S. “Mideast: Focus on the Possible.” The

> 在不人性的世界中保有人性

怀念Vladimir Yadov

by Dmitri N. Shalin, 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 美国



2009年80岁生日的Yadov。

在 1960 年代，Leningrad 的“具体社会研究室”是社会学研究的重镇。其防止了科学研究免于被历史唯物论所攻陷。这些社会学家跟政府说，社会学的工具可以让共产主义更加进步，并且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预测可以被精确地观察到。Vladimir Yadov 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带领了俄罗斯社会学的复苏。要晓得，在那之前的社会学可是被 Bolshevik 革命和 Stalin 的斗争所毁灭了。Yadov 的先驱研究 *Man and His Work* 是和同事一起撰写，其《Methodology and Methods of 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则推动了整个学科的前进。

1968 年的时候，我是 Leningrad State 大学的三年级学生，而我的导师 Igor Kon 把我带到 Yadov 的实验室。接下来的 8 年，我参与了研讨课程，从大学生变成了博士生，然后成为研究助理。那是在大城市中的一个研究核心，由 Yuri Levada, Igor Kon, Georgy Shchedrovitsky 所带领，他们的自由派观点，对于国际文献的熟稔，以及敞开办公室大门的政策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并且让许多年轻社会科学家非常印象深刻。

Yadov 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不刻意的去做某

些事情，以及他对于权位追求的毫无兴趣。他愿意跨出官方教条的局限，这点很特别。他跟大学生和学者讲话的态度并没有不同，我还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解释个性理论的一些细微部份的时候，他的办公室同事就在一旁等着他。真正重要的是他对于社会学解释的贡献，因为那时候的社会学研究有着很深的价值取向，并且是替社会主义政权服务的。这些价值其实和社会学理论的发现很多时候并不一致，例如，工人对于党要求的无私奉献并没有什么热诚，但是对于工作而得的物质回馈却是在意的。六零年代的时候，经验社会学开始挑战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可是在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想要去镇压布拉格之春的时候，苏联社会学和其自由派就非常艰困。Yadov 因此努力要拯救自己的团队，也就是部份的苏联科学院，但是最后他自己却被赶出去了。Yadov 总是有尊严地拒绝去批评自己的同事，也拒绝在这种不人性的环境下泯灭人性。^{注1}

在 1975 年，我从俄国移民到美国。我和 Yadov 的联系要一直到 1987 年才恢复，那时候 Mikhail Gorbachev 开始了政治改革。那些年对于俄国社会科学家来说是一直想要填补的一段失去但是令人兴奋的历史。^{注2} 很快

地 Gorbachev 要求开放政策 (glasnost) 和经济改革 (perestroika), 之前被斗争的学者也被找回去带领新成立的机构, 像是社会学研究所 (Institutes of Sociology), 民意研究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Study of Public Opinion)。Yadov 那时已经搬到了 Moscow, 很快成为了知识圈的领导^{注3}。他被选为俄罗斯社会学会会长和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他致力于研究劳动, 后来也是 ISA 的副会长。

专业伦理守则 在 1988 年由一群有心改革的学者成立, 确保学术研究自由, 因为这对社会科学来说非常重要。这些伦理规范鼓励社会学家去“容忍和尊重”反对者, 展现“conviction 的勇气”, 避免“意识形态标签”, 避免“诉诸权威”, 然后反省过去, 解放那些在追求灵魂的时代的俄国知识分子^{注4}。

在经济改革的时候, 有些人宣称自己是隐性的异议人士, 许多人竭力想去批判苏维埃的过去, 而多数人明显地丢掉了自己的党证。但 Vladimir Yadov 不是这样的人。当他在自由派知识分子被迫害的时期感到万分痛苦的时候, 他并没有加入政府。他把他的党证保留下来, 并且始终相信 Palmiro Togliatti 拥护的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 因为他认为那是最符合人性的政治经济系统。他也鼓励其同事去把社会问题看成自己的研究问题, 显示了知识如何可以和社会改革连结在一起。“我社会学家们不应该只是满足于写书而已, 我们还要尽力去改善社会。”Yadov 写道, “对抗贪腐、建立中立的法院, 成立进步的税收制度, 以及还有很多事情, 这些都是人民所要求的!”

历史的转轴在 Putin 掌权之后再次加速起来。他一开始并没有揭露自己的政治计划, 但是在第一任总统之后, 其越来越清楚显示了对于公民社会的蔑视。后苏维埃的社会学者发现到批评政府已经不再安全了, 而那些参与公共抗争和坚持公民权利的学者面临到了很大的阻碍。

在 2010 年, 极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成立了一个敌对的社会学会, 挑战 Yadov 和其同事的组织^{注5}。在 Yadov 挺身对抗俄国民族主义学者和敌对学会的 Gennady Osipov 后, 他却必须替自己辩护, 因为他指控对方是法西斯主义者。面对反动的政策、自身的衰老和疾病, Yadov 觉得自己越来越边缘化。

2009 年, 在 Yadov 的 80 岁生日的场和尚, 其学生和朋友发表了他的荣誉论文集, 表彰 Yadov 对于俄国社会学的贡献。Volodia 是其朋友对于 Yadov 的称呼。他一直对于国家的远景感到乐观。他持续辩论各种议题, 并且热衷研究。但是其心情却是沉重的, 因为俄国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充满了人权迫害和民族主义教条

的事件。

我和 Yadov 的联系在 2006 年开始频繁起来, 那时我和我的同事 Boris Doktorov 开始了一个“国际传记计划”, 这是一个网络上纪录二战后社会学复苏的计划。我们搜集俄国社会学家的访谈, 网络论坛, 并且推动社会研究的传记方法^{注6}。Yadov 对于这个计划很赶兴趣。他撰写回忆录, 接受访谈, 提供很少见的数

据, 特别是关于早期的苏联社会学以及在赫鲁晓夫解冻结束之后的演变和经济改革时的转型。Yadov 于 2015 年 7 月 2 日过世。在那之前的几年, 我和他针对俄国社会学的命运开启了一连串的网络对话。我们彼此同意去挑战彼此, 我们讨论学者在面临苏联政权时做出的妥协, 知识分子选择出走时的道德难题, 留下的道德代价, 苏联社会学在 Gorbachev 革命后的转型, Putin 政权下言论自由的迫害, 政治改革的悲观前景, 以及公共社会学的未来, 特别是在一个会因为说实话和做批判研究而受到迫害甚至丧生的国家里面, 这些议题是如何有其特殊之处。

Volodia 很直率的回忆他的亲人在 1937 年遭到整肃、对于自己的犹太血统的不安、以及怎么在一个反犹太主义的国家里面隐藏自己的族群认同。他告解道, 过去的妥协其实让他今天很不好受, 他“在他无法去 Moscow 替 Yuri Levada 辩护的时候, 他非常胆小怯懦。”他“在许多同事在党会议里面遭到斗争的时候, 他选择了沉默。”

质的外向的人”, “很难保护机密信息的人”。他是这些特质“有助于友善的沟通”和“帮助他成立研究团队, 这个团队的表面象征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集体的贡献却是最重要的事情。”

“真的, 耶稣是第一位社会主义者!” 当 Yadov 被挑战其政治信仰的时候, 他会这么说。

“我一直是社会主义者。”他很骄傲的这么告诉我, “我深信社会正义的实现在于民选的代议士努力想要减少贫富差距。”

Yadov 对于那些选择出走的人有这样的解释: “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 但同时我也觉得他们有着不同的理由。”很有趣的是, 他解释在经济改革的辉煌时期, 也就是他是社会学研究所的所长的时候, 他挑选年轻的学者出国深造的同事, 也焦虑地看着“谁会回来而谁不会, 因为英国委员会是规定所有人都要回来的。”

Yadov 会对那些拥抱极端政治信念和想要恢复苏联帝国的同事感到愤怒。“在苏维埃时代, Osipov, Dobrenkov, Zhukov 属于党的干部, 而且至今都还保留这个地位。他们独尊“沙皇的价值”, 我所知道的 Osipov 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 会说谎, 会设计他人。”Yadov 对于

其他学者和管理者有着很诚实的观察。我相信他这边所说的故事日后会让其他的俄国社会学家很惊讶，他对于当前政治的评断也是。

Yadov 已经从远离当前的政治事务了，这点可以从他在 2011 年 6 月 25 日写给我的信中可以看见：“对于 Putin，我除了厌恶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感想。他是一个严峻且犬儒的人，在乎权力却轻视自己的人民，并且追求财富和奢华。当他被问到对于自由政治看法的时候，他居然说，那些自由派只是想要掌权和钱而已！但是这个人的财富却可以透过垄断石油管线而不断增加。毫无疑问的，这人可以斗争任何人，包括了 Dmitri Medvedev（总统）？你可以想象未来 30 年他会怎么地被历史负面的评价。”

我和 Yadov 的对话适时地在俄国开始了，并且反映出了他在晚年最关心的、以就是其一生为何而战的议题^{註 7}。

不论是否选择站在历史的潮流上，你会发现你始终会被卷进违反你意愿的战场之中。或是你是自愿加入战场的话，那你必须面对道德的难题和代价^{註 8}。在 Yadov 的晚年，他告诉我的助理 Boris Doktorov 说，认为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人”且“有个非比寻常地快乐的人生”。我想，主要原因是他奋战过，也回避过一些纷争。Yadov 象征了一个非常有情绪智商的人，因为他试图保持理性与清醒。他有妥协，有犯错，梦想有实践、也有幻灭的时刻，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希望。

今天，我们纪念 Vladimir Yadov，一位谦卑但勇敢的学者。我们庆祝这位公共知识分子的一生对于历史、社会制度、集体记忆的贡献。世界因为有了像 Vladimir Yadov 这样的人而变得更美好。■

來信寄給 Dmitri Shalin <shalin@unlv.nevada.edu>

註 1：見 Shalin, D. (1978) “The Development of Soviet Sociology, 1956-1976.”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 171-91; (1979) “Between the Ethos of Science and the Ethos of Ideology.” *Sociological Focus* 12(4): 175-93; (1980) “Marxist Paradigm and Academic Freedom.” *Social Research* 47: 361-82; Firsov, B. (2012) *History of Soviet Sociology, 1950s-1980s* (in Russian). St. Petersburg: European University of St. Petersburg.

註 2：Shalin, D. (1990) “Sociology for the Glasnost Era: Institutional and Substantive Change in Recent Soviet Sociology.” *Social Forces* 68(4): 1-21. Doktorov, B. (2014) *Contemporary Russian Sociology.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Investigations* (in Russian). Moscow.

註 3：(2009) *Vivat Yadov! On His Eightieth Birthday* (in Russian). Moscow: Institute of Sociology RAN.

註 4：Firsov, B. (2010) *Dissent in USSR and Russia, 1945-2008* (in Russian). St. Petersburg: European University of St. Petersburg (2010); Alekseev, A. (2003) *Dramatic Sociology and Sociology of Auto-reflexivity. Vols. 1-4* (in Russian), St. Petersburg: Norma. See also Shalin, D. (1989) “Settling Old Account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29; and (1990) “Ethics of Survival.”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4; (1987) “Reforms in the USSR: Muck-raking, Soviet Style.” *Chicago Tribune*, February 16.

註 5：Yadov, V. (2011) “A Sordid Story” (in Russian). *Trotsky Bulletin*, December 6; Shalin, D. (2011) “Becoming a Public Intellectual: Advocacy, National Sociology, and Paradigm Pluralism,” pp. 331-371 in D. Shalin, *Pragmatism and Democracy: Studies in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Progressive Politic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註 6：International Biography Initiative. UNLV Center for Democratic Culture, <http://cdclv.unlv.edu/programs/bios.html>.

註 7：(2015) “From Dialogues of Vladimir Yadov and Dmitri Shalin” (in Russian). *Public Opinion Herald*, No. 3-4, pp. 194-219, http://cdclv.unlv.edu/archives/articles/vy_ds_dialogues.pdf.

註 8：Shalin, D. (1993) “Emotional Barriers to Democracy Are Daunting,”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27; (2007) “Vladimir Putin: Instead of Communism, He Embraces KGB Capitalism.” *Las Vegas Review Journal*, October 24.

> 凝视在地、 面向世界

by Brigitte Aulenbacher, Johannes Kepler大學(Linz), 奥地利, ISA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RC02), 貧窮、社會福利、政策研究委員會(RC19), 工作社會學研究委員會(RC30), 女性和社会研究位会(RC32), ISAVienna2016社会学论坛在地筹备委员会副会长; Rudolf Richter, University of Vienna, 奥地利, ISA家庭研究委员会(RC06), 在地籌備委員會會長; Ida Seljeskog, University of Vienna, 在地筹备委员会



Vienna大学一隅。Vienna大学摄影。

在地委员会欢迎世界各地的社会学家到奥地利Vienna参加第三次社會學論壇

下一个月，我们在地筹备委员会将欢迎ISA的全球学者来参加在Vienna举办的第三届ISA社会学论坛。也请莅临我们的[网站](#)。我们会强调在地和全球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

生活和社会学历史所受到的启发

我们很荣幸有机会在Vienna大学举行这次ISA论坛。Vienna大学在社会科学和哲学有着很强的传统，而筹备委员会已经筹备了超过2年了，并且受到许多奥地利其他大学的帮忙，以及来自Innsbruck，

> 走向在地：对于奥地利日常

>>



Vienna大学外观。Vienna大学摄影。

Graz, Linz, Salzburg, Vienna 和匈牙利的学者的协助。

我们想要欢迎妳到来和我们一起“在地化”，见面、讨论、并且受到 Vienna 的国际文化熏陶和感染。此外，我们也鼓励大家彼此认识，并且会有游览参观活动。

加入我们一起参观传统的 Vienna 红酒吧，并且步行参观城市。我们的社会学旅程包括了有导览的 Marienthal 博物馆参访，其位于 Gramatneusiedl 的村庄，也就是著名的 Die Arbeitslosen von Marienthal 或是“Marienthal：失业村庄的社会志”。Marie Jahoda, Paul Lazarsfeld 和 Hans Zeisel 告诉了我们失业怎么摧毁了人的社会生活。他们的发现和混合方法启发了许多研究，至今还是很有影响力^{注1}。

Vienna 的社会学传统和奥

地利只可以从更大的历史和社会脉络下来理解。一方面，我们有“红色 Vienna”，也就是上个世纪的初期。但是另一方面，包括了上百位的奥地利社会学家也都逃离的纳粹占领的奥地利。许多讨论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和对于奥地利社会学影响的文章可以在 ISA [论坛部落格](#)上找到。

> 走向国际：追求很美好的社会

最为主办 ISA 论坛的社会学家决定使用“全球社会和追求更好的社会”让我们去反思在地和全球之间的关系。

Vienna 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城市，位在欧中的中新。邻近国家的强大影响力可以在该城市的文化、料理、语言种找到证明。该城市有许多的国际机，包括了欧盟的议院和 Vienna 的 UNO 城市，其支持论坛作为国际论述的场域。然而，

ISA 的上一次于横滨的世界大会（面对不平等的世界）还是很重要，因为我们邀请了来到世界各地的学者，所以必须承认奥地利和欧洲所面对的挑战，因为欧洲有维护平等、政治、民主、人权社会的责任。叙利亚的战争和殖民与后殖民的历史迫使人们逃离和迁徙。

许多欧洲人已经试图争取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了，其透过的方式包括了抗议和支持反对暴力和不平等的提案。但是另一条路把奥地利和欧洲看成一个封闭的社会，推动的是排外的政治，想要关闭边界和让不平等持续。而论坛将在 Vienna 举办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契机，因为现在的像是难民、被迫迁徙、族群融合的政治的议题都是欧洲正在处理的挑战，而且右翼运动蓬勃展开，他们想要建立一个不包括“非欧洲人”的欧洲。这让人想起发生才不是很久、很可怕的欧洲史。

>>

奥地利的是会学政在面临所有的这些议题，而奥地利的社会学家也都和全球有着紧密的结合。这些挑战和连结反映在了场次的安排上面，来自世界各地的演讲者将会讨论“面对欧洲及其之外的多重危机”，“社会学思想和追求更好的社会”。

最后，ISA 和在地的筹备委员会已经邀请的地方和国际的出版社，并且会有一个专门的地方展示其出版品，也会有作者面对读者的活动。展示大厅也会展示奥地利的社会学、研究机构，奖学金等等。

＞一起来 ISA 论坛

在过去十年来，ISA 的讨论已经着重在对于全球和在地的交互关系必须要更加敏锐才行。的确，许多的当代地方的斗争其实士被全球的潮流所导致的，像是劳动和自然的市场

化，工作和政治的跨国化，集权或是民主国家的重要转型等。当我们在 7 月在 Vienna 见面的时候，我们都会讨论这些议题的，而且就像世界上社会学家一样，我们也会在地方和全球的脉络下讨论。论坛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一起这样的全球对话。最后，我诚挚欢迎各位到奥地利的 Vienna 来参加 ISA 第三届社会学论坛。■

來信寄給 Brigitte Aulenbacher <Brigitte.Aulenbacher@jku.at> 和 Rudolf Richter <rudolf.richter@univie.ac.at>

註 1：見 Richter, R. “The Austrian Legacy of Public Sociology.” *Global Dialogue* 5(4), Dec. 2015,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the-austrian-legacy-of-public-sociology/>

> 奥地利的不平等、贫穷、繁荣

by Cornelia Dlabaja, University of Vienna, 奥地利, Julia Hofmann,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Linz, 奥地利, Alban Knecht, Johannes Kepler大学(Linz)

奥地利长期被认为是高生活水平的国家。其 GDP 是 51,300 美元，排名第 14 位 (2014, 世界银行)。而长期的公共住宅传统让 Vienna 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社会稳定状态。但是这不表示奥地利每个人都很富裕。

仔细看特别的社会群体后，我们会发现一个相当分隔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有 12% 的人口暴露在贫穷的风险中，移工的风险则是 33%。虽然经济不平等在 OECD 国家中不是很明显，在 1990 和 2011 之间，后 20% 的贫穷人口的收入减少了 47%，而前面 1% 的收入增加了 16%。整体说来，奥地利的不平等是很明显的，基尼系数是 0.75。

而怎么解释这个富裕国家的这种不平等呢？奥地利教育系统导致了代间社会地位的传承。大学毕业生的后代有 2.5 倍更高的机会可以上大学。而就像其他国家一样，教育也决定了收入。每个多一年的教育增加了收入大约 5.4%。移工特别是教育体系中的弱势（部份因为国外教育可能不被承认）。

性别不平等也是问题。年轻女性现在比起男性有比较高的教育程度了，但是女性仍然比男性赚了少了 23.4%，奥地利女性也拥有得比男性少，女性的单身家

庭的财产少了男性单身家庭约 40%。这个性别不平等是连结到整个福利体系的，因为该体系“保守”，支持了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而缺少儿童照顾中心以及传统家庭规范的持续，这让女性一直很辛苦。

奥地利的劳动市场政策越来越像弹性化迈进，让不平等继续持续。移工和女性更有可能从事低薪的危险工作。失业

“那些在奥地利发生的
不好的事情，世界其他
地方也难以幸免。”

率虽然低，但是逐渐在攀升，这特别影响了低技术的工人和移工。

若更仔细的看奥地利的社会结构，虽然说看似稳定，但是却逐渐的沿着性别和族群的轴线极化、分裂，缓慢迈向社会不平等。现在很流行说任何坏的事情都来到奥地利了，但是几年之后就会扩散到全世界。■

來信寄給 Cornelia Dlabaja <cornelia.dlabaja@univie.ac.at>, Julia Hofmann, <julia.hofmann@jku.at>, Alban Knecht <alban.knecht@jku.at>

> 社会不平等、难民、“欧洲梦”

by Ruth Abramowski, Benjamin Gröschl, Alan Schink, and Désirée Wilke, Paris Lodron University of Salzburg, 奥地利



在难民营和人道修辞表面下的社会真实。Arbu绘。

难民潮大量涌入欧洲，有时候被德国媒体称为“新大迁徙”（Völkerwanderung）。德国接受了最多的难民申请，但是若是相对于国家人口总量，德国只是排在欧洲的第5名，匈牙利是接受最多移民比例的国家，瑞典第二，奥地利第三，芬兰第四。

奥地利认为自己在这个潮流中被困住了。德国和奥地利的边界地区，特别是在

>>

Salzburg 和 Freilassing，已經變成了難民到達中歐的集中地，奧地利的社會也有許多的緊張和不安。一方面，儘管友人對於歐洲的難民危機的抱怨和邊界管制呼籲，許多人還是懷抱著歐洲夢。另一方面，恐懼和抱怨導因於偏見，因為人們認為難民是自愿被吸引來歐洲的，而非被迫的。

按照 UNHCR 的說法，在 2015 年有 6 千萬的人遠離家園。多數難民是因為戰爭被迫離開，或是基於貧窮或是飢荒等因素，特別是後殖民之後的政治惡化。但是只有不到 3% 的這些人到了歐洲，其他都是到鄰近的地區。

2015 年，只有 50,000 人在奧地利申請庇護 (UNHCR-Austria, 2015 年 9 月)。這個數字是每 100,000 人有 332 人申請。其中的 11,000 人背成認為難民，得到了基本的物質補給 (82 歐元 / 月)。雖然其他人還在等待結果，通常需要 3 到 6 個月，他們得住在帳篷中，每天可提供三餐，但是確有可能一天都吃不到熱的食物。然後還有一張床。此外，他們有 1.3 歐元的每日零用金，之後則是租金補貼 120 歐元 / 月 (家庭是 240 歐 / 月)，200 歐元是零用金 (小孩 90 歐元)。重要的是，他們不被允許在等待的時間工作 (Art. 15a B-VG, BKA-

Austria)。

我們訪談了約 30 位難民，地點多在難民营或是庇護中心，許多人都有其未來的夢想：希望可以是這個社會的一部分，有工作，為家庭奮鬥，或許還可以買房子。簡單說，就是希望不要活在恐懼之中。

在這情況下，也就是人口老化和低生育率普遍存在富裕的歐洲國家，難民可以被視為是老化社會的希望：年輕和高生育率，高技術的人 (聯合國世界人口前景：2015 報告)。長期看來，難民可以幫助保留我們國家的福利和社會體系，短期則可以刺激經濟，特別示弱他們有機會工作、賺錢、繳稅。

從實用角度的觀點來說，我們因此應該問：為什麼我們會要辯論是否難民要被遣返，而不是討論如何讓他們融入社會？■

來信寄給 Ruth Abramowski <ruth.abramowski@sbg.ac.at>, Benjamin Gröschl <benjamin.groeschl@sbg.ac.at>, Alan Schink <alan.schink@sbg.ac.at>, Désirée Wilke <desiree.wilke@sbg.ac.at>

> 性別平等和奧地利的大學

by Kristina Binner, Johannes Kepler大學(Linz), 奧地利, ISA 貧窮、社會福利、社會政策委員會(RC19), 女性與社會委員會(RC32), Susanne Kink, Karl-Franzens大學(Graz), 奧地利

女性与男性长期以来在奥地利的大學里面就有不太均等，虽然学生的男女比例看起来有点平均（男57%，女43%），但是学者就不是这样的比例了。教授之中，仅仅22%是女性。而最近大学的改革会让性别更加平等吗？

> 奥地利的创业和管理大学

自从2002年的大学法案实施以来，新的公共管理模式被引进去重组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现在，大学被要求像是企业一样，要创业也要管理。虽然政府从前者的角色退下，但是大学要去彼此竞争财务或是象征资源。副校长已经被赋予更高的决策权力，而像是专家委员会或是学校咨询委员会也很重要。这些改变主要是去让大学能有更好的领导角色、正专业的能力，但这些改革有办法增进性别平等和家庭友善吗？

> 性别平等？

“最近的改变可能带来更多的平等。”

作为在2002年大学法案所定义下的“自主的组织”，奥地利的大学有责任去引进性别主流政策，包括了建立协调中心，确保机会平等，建立工作小组推动机会平等，设定40%的妇女保障名额。

我們還不清楚性別平等政策是否會被大學的新預算模式所支持，因为虽然每个大学有责任去实现新的性别平等要求，但是个大学的财务资源是不一样的。总体来说，大学的重新组织和新的性别主流措施似乎是可以增进性别平等的，特别是在科学领域。

> 家庭友善？

家庭的需求已经被认为是对于女性学者来说是个障碍，所以奥地利的大學已经使用一种管理策略，像是“大学和家庭”的监督，这是被政府所支

持的。透过提供好的儿童照顾，大学用这种方式来吸引人才。同时，保守的亲职文化也体现在大学对于儿童照顾的重视，把女性视为母亲，再生产了异性恋家庭的图像。

奧地利的大學的最近的改變反映了經濟化、性別平等、家庭友善政策之間的複雜關係。然而重要的是，雖然這些方法可能會在組織的層次上產生影響，科學文化和規範則有著性別化的預設。例如，人們預設學者總是以工作优先。而学者必须总是可以联络得到和有弹性，这点反映了男性的工作时间分配。女性多数是照顾者，所以是很难达成这些期待的。■

來信寄給 Kristina Binner <Kristina.Binner@jku.at> 和 Susanne Kink <susanne.kink@uni-graz.at>

> 工作時間和追求更好的生活

by Carina Altreiter, Franz Astleithner and Theresa Fibich, University of Vienna, 奧地利

对于工作时间的斗争向来是在历史上和工人反剥削的斗争相连一起的。一天八小时的工时是工运的诉求，而直到1980年代许多的西方工业国家逐渐都减少了工作天数了。

而从那时候开始，除了法国之外，虽然看到了生产量的提升，但是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进步。可是最近的全球经济危机已经把关于不平等分配的议题放到的辩论的议程之中了。透过Eurostat的数据，我们讨论现在在欧盟的工作时间发展状况，以及和挑战不平等如何相关。

> 工作時間和不平等

一方面，有些欧盟的人工作时数很长，32%的人一年内又超过一个月的时候是一天工作超过10小时的。其他的问题像是兼差工作(2014年是20%)或是失业(2015年8月是9.5%)。工作强度的提升，不论是物理或是生理上的疾病都是因为高

工时所引起的。而工人沮丧和劳动力贬值也是另一个面向。这些只是工作时间极化的部份后果，这也威胁了整个社会。

另一方面，两性之间也继续有着不平等的工作时间分配现象发生。第一，正职工作和长时间工作是“男人”的事情，然而越来越多的女性只有兼差工作。即使欧盟的多数28个国家中男性的兼差比率增加到2014年的8.8%，女性的兼差比率还是有三倍之高(32.5%)。第二，女性比男性的家务工作时数一天要多上2个小时。这些都让女人更加弱势，生涯没有发展性，福利不多，更有可能在老年时候步入贫穷。

> 减少工作時間會減少社會不平等嗎？

改变工作的标准时数将会满足许多劳工的需要。研究显示超过30%的工人宁愿工作少一点，然而许多兼差工人(2014年有一千万)则偏好工作久一点。但是减少标

准工时减少正职和兼差之间的不平等，也会增进性别的平等。此外，减少失业人数，缩短每周工作天数会增加工人的议价权力，或许会对不平等有所帮助。

然而，减少有给工作時間並不會自動地產生正面的重分配影響。若是工作時間的减少是解放計畫的一部分的话，那政策就要必须考虑像是工作强度增加和工业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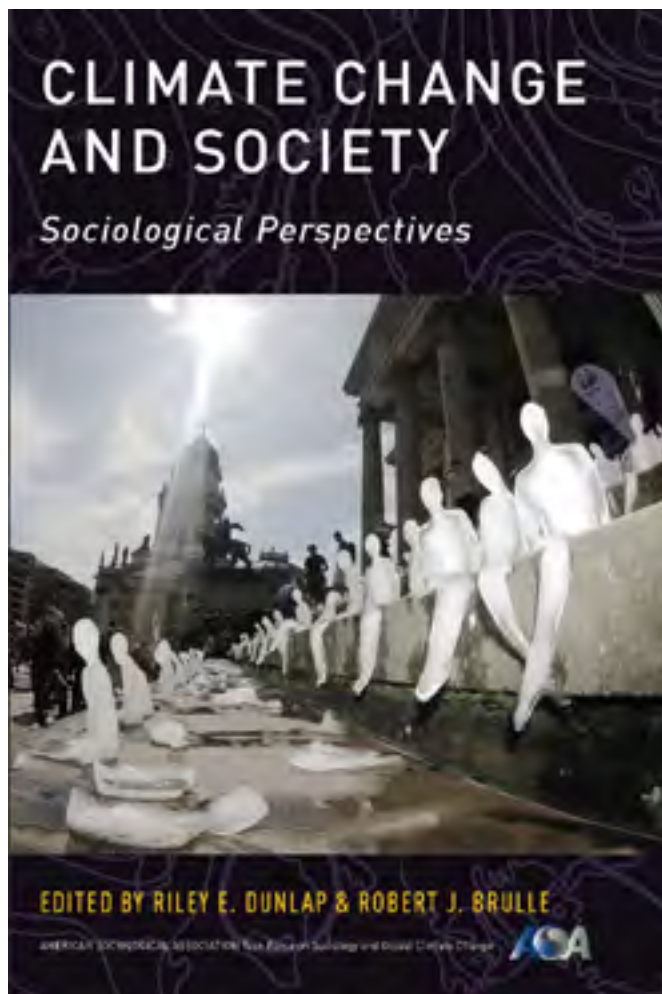
“男性和女性的工作时数还是是不平等。”

係的去管制化等的挑战，以及要有配套措施去确保无给劳动的重分配。■

來信寄給Carina Altreiter <carina.altreiter@univie.ac.at>，Franz Astleithner <franz.astleithner@univie.ac.at>，Theresa Fibich <theresa.fibich@univie.ac.at>

> 社会学和气候变迁

Riley E. Dunlap,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美国, ISA环境和社会委员会委员(RC24)
， Robert J. Brulle, Drexel University, 美国



Riley Dunlap 和 Robert Brulle 是傑出的環境社會學家。他們分別是美國社會學會的社會學和全球氣候變遷專案研究小組的主席和副主席。其報告最近集結成書，《Dunlap and Brulle》(編輯)，《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其開創行的研究顯示了國家的社會學會如可以透過鼓勵研究合作來討論社會和政治的議題。

人 类索引引起的气候变迁是我们这个时代主要的问题，并且代表了一种存在的、长远的威胁。自然科学家已经纪录分析的暖化，就像一个世纪前的“温室效应”的发现一样。1990年代之前，科学已经成为了相当制度化的领域，提供了强而有力的证据指出地球正在暖化，并且对地球的自然和社会有着负面的影响。这可见跨政府气候变迁论坛 (IPCC) 的报告。

面对这样全球暖化的证据，特别是减少碳排放量，自然科学家已经辨认出了气候变迁其实是“人的问题”，也就是说，是被人类行为所导致的，然后反过来影响人类自己。所以要改变的话，是要透过集体行动才得以可能的。IPCC，联合国研究委员会，以及其他主要的研究组织，像是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国际人类多元研究委员会的全球环境变迁计划（后来的未来地球计划）等等，都已经呼吁要社会科学也加入气候变迁的研究之中了。

类似地，这些呼吁建议社会科学家可以帮助“教育公众”气候暖化的知识，并天真期待公共的理解可以造成政策的改变。在缺乏社会学观点的情况下，这些努力把个体看成是主要的行动者，是这些个体制造碳排放，但却忽略了社会学其实是把个人行动放到社会结构的脉络下来理解的，所以整个忽视碳排放是和社会、经济、政治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

更广泛的来说，既有要整合社会科学到气候变迁研究的努力主要是采取“后政治”的立场，要去把气候变迁去政治化。例如，IPCC 把气候变迁主要看成是一种自然物理现象，是可以被科学证据、技术突破、管理技巧等解决的，并不考虑社会经济秩序的基本重组。

在这个脉络下，美国社会学会 (ASA) 成立了一个“社会学和全球气候变迁”的项目小组，负责让大家知道社会学分析气候变迁的价值。而项目小组的领导成员认为我们应该要做更多，而不是只是写报告给 ASA 而已，因为我们的听众不只是 ASA 成员，还包括整个公众。所以，我们的书：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由 Oxford 在去年 8 月出版，作为 ASA 的官方出版品。

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 总结了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对于气候变迁的分析。十三个章节主要是由 37 位学者所撰写而成，分析气候变迁的驱动力为何。重点则放在市场组织和消费。而气候变迁主要的影响和因应的对策也是另外一个主题，重点放在不平等上。还有社会过程，包括公民社会、公共认知、组织性的拒绝气候变迁等等。此外，各个章节也研究了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

对于要求要有更多的社会科学介入的声音，该书有所回应，并且展现了社会学分析的独特性。因为全球气候变迁的主要驱动力是镶嵌在社会结构和制度、文化价值、意识形态之中的，所以全球暖化的分析是需要考虑到各个程度的社会过程的，从全球的层次到在地的层次。该书的第二目标是去刺激进一步社会学研究，涵盖这个主题，因为社会学可以帮助理解气候变迁，不仅仅是透过贡献给已经存在的研究计划或纲领，也可以奠基在社会学理论和观点上去提出新的研究问题。

社会学的角色也包括了提供社会批判。既有对于气候变迁的分析总是局限在近似霸权的想法上。例如，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年代，我们总是预设只有市场为基础的政策才是可行的，才是可以减少碳排放量的，但是这个盲点局限了行动的可能，所以社会学究可以在这点上面有所发挥的空间，超越单一向度、后政治的思考模式，质疑背后的默认，进而影响政策

制定。

这种的气候变迁公共社会学包括了纪录达成显著碳排放减量所面临的困难（若不是不可能性）的同时也保持传统的经济成长。而社会学的发现可以促进对于气候政策的公共辩论。开创一个知识的空间，好让批判的观点可以进来，那这是对我们的学科来说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们希望全世界的社会学家可以加入 ASA 的这个项目小组，一起来努力！■

來信寄給 Riley E. Dunlap <rdunlap@okstate.edu> 和
Robert J. Brulle <brullerj@drexel.edu>

> 印度的自由和暴力



议会政党副主席 Rahul Gandhi 和学生在 Hyderabad 大学，正值对 Rohith Vemula 的死所激起的抗议事件。2016年1月于 Hyderabad。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要发表 ISA 的执行委员会的一篇声明，以及另一篇由超过 200 为印度社会学家所撰写的，并在 2016 年 3 月 6 日交给印度的总统。这篇声明主要是抗议印度校园的暴力和学术自由的沦丧。即使是由事件所引发，但是却有着历史的重要性，因为表达了社会学家对于学术和社会的自由的深切关怀。

别急迫性的。

我们支持印度宪法所提出的多元观点，拒绝任何宗教去框限这个国家。在一个反智的环境中，以及多数的攻击事件都发生在校园内外的公共场域之中，我们作为专业社群一分子的可谓任重道远。作为社会学者，我们深信放任这些压制言论自由的事件发生，用 Amartya Sen 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对于不容忍的过度容忍。

我们要接下的声明请愿背书。那声明是由印度超过 200 位社会学家所发起送交印度总统的，主要抗议对于社会学家的暴力攻击，包括 Vivek Kumar 和 Rajesh Misra 教授，施暴者则是 Bharatiya Janata 政党的学生支部。

大学是提供自由辩论和相互学习的空间，而近来发生在各大校园的暴力事件明显了限缩了这样的自由空间，特别是限制对 Hindutva 纲领的反对言

>ISA 声明：

我们是国际社会学会的执行委员会。我们和印度的学生、老师、作者、艺术家、运动者站在一起，共同为争取言论自由和各项权利而奋斗，抗议校园中越来越暴力的攻击行为和右翼基本教义的歧视和暴力。我们特别关心对于弱势群体的暴力攻击和食物自由的

侵害（被错误的认为是“禁止牛肉”）。

电子媒体有很大一部份被用来当作右翼民族主义的宣传机器，系统性和暴力地针对知识分子、学生、运动者，这些违反伦理的报导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特别担心。而从弱势群体来的学生，特别是 dalit-bahujan，是有特

论，这对支持言论学术自由的国际的社会学社群来说是个令人担忧的事件。

而 2016 年 1 月 Hyderabad 大学社会科学博士生 Rohith Vemula 的自杀事件（这也是这所大学的 dalit bahun 的博士生的第 9 起自杀案件）是肇因于他和其他四个人被从他所待的青年旅馆赶出来后并且被排挤。这是一个深植于这个文化的歧视案例，虽然弱势群体在校园中逐渐被看见，但是 Rohith Vemula 的死激起前所谓有的抗议浪潮，国内国外都是如此，特别是那些 dalit bahun 的学生，因为他们所受到的歧

视是最严重的。

我们支持印度各地的师生去质疑歧视和多数暴力，并在校园内外都推动反卡司特的哲学和社会世界，防止右翼的暴力攻击。作家也是老师的 Perumal Murugan 被赶出家乡到首都，这个经验不是偶然。我们也欣慰看见像 Rohith 的年轻学者勇敢批评 Hindutva 政治，造成了很大影响，让许多有创意的社会抗议接连兴起。

我们支持 Jawaharlal Nehru 大学 (JNU) 的学生和老师对于这些暴力攻击事件的抗议，并且支持对于复杂民族主义议题的公共辩论。我们珍惜他们在

Rohith Vemula 的基础上所建立的信念，并且认为是一个转型中的社会学的一个象征，质问学科边界和高等教育制度内的排外主义，因此搭起学术和社会之间的桥梁。■

> 印度社会学家致印度总统的公开信

2016年3月4日

Shri Pranab Mukherjee
印度总统
Rastrapati Niwas
New Delhi

亲爱的 Shri Pranab Mukherjee:

我们是起草这篇声明的社会学家，包括在职和退休的教师与研究者，来自全印度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我们被近来持续发生的事件深深所干扰而不安，认为有必要发表这篇声明。

印度的宪法保障所有的公民有权利可以有自己的信仰和和平表达信仰的诉求。我的强烈的呼吁大学和学术的自主性，并且这些地方是行使公民权利的重要场域。我们因此对学生、教师、职员近来所受到的攻击感到担忧，并且认为这些攻击事件受到警方和政府的默许。学和老师受到恶劣的对待，攻击，威胁，而施暴者却似乎逍遥法外。

我们特别要表达们对于以下的人的支持：Vivek Kumar 教授 (JNU) 和 Rajesh Misra 教授 (Lucknow 大学)，Kumar 教授的演讲 (2月21日在 Gwalior 大学) 被 ABVP 恶意的中断；Misra 教授也被 ABVP 所威胁，且仅仅是因为一篇发表在脸书和报纸 (2月23日) 上的文章。而大学却要他做出解释，却不去问施暴者为什么施暴。

我们深深相信，学者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表达对社会议题的看发的自由。箝制学术自由是和国家利益相违背的，也戕害我们对于这个多元社会的理解与认识。我们再次重申，我们对于我们坚强的学术传统有着很高的信任，多元的观点不但深化了民族主义运动，也强化了印度的公共论述。■

> 学术研究写作

逻辑与实做

by Raewyn Connell, University of Sydney, 澳洲, ISA女性与社会研究委员会委员(RC32)、概念与术语委员会委员(RC35)



马太在天使的引导下写福音

> 迷思与现实

有两个很大的迷思扭曲了我们对于写作的想象，一个是旧的，一个是新的。旧的迷思把写作视为是一种天赋和受到启发的一件事情，某些天才早上坐在书桌前，拿着笔就文思泉涌，笔不停歇的开始写作，没有人知道这到底怎么发生的。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景仰，然后希望缪思女神某天也附身我们。

新的迷思没那么诗意。其来自于心自由主义的管理者的脑中，反应了其对于竞争的迷恋。这个迷思认为写作不过就是一种市场上的商品，卖的就是作者呕心沥血的文字。最好的利润，就是名声和升迁，而且必须发表到引用点数很高的期刊上。

两个迷思反映了一定程度的现实，但不是总是这样子的。写作大部份的时候的确是一个人用笔或计算机前后斟酌、反复修改其想法而成的。而且越来越必须要发表到竞争性高的商业化期刊中。

但是，上述两个迷思也扭曲了写作的真实面

貌。两者所重视的个人天赋或是成就其实很大程度是一种社会过程。两者都忽视了一个很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写作其实是一种对话。两者也都忽视了研究写作是一种集体创造和散布知识的过程。

不论在社会学或是其他学科中，写作都很重要，特别是因为写作是整个集体知识创造和传布的核心。许多在年轻学者看来很武断的学术写作特征都要放在这个脉络下才得以可能理解。

写作的政治也唯有在思考了写作相关社会制度和结构后才可以被理解，包括了“排名表格”的影响和期刊商业化，知识生产者的不稳定劳动问题，国际的排名阶层，名声，资源，因特网的使用和风险，知识形成和传布的民主化过程。

> 写作的取径

关键在于把写作视为是一种社会劳动。这是一项工作，而且我们可以展现这如何可能，即使在最杰出的文本中也是可以的。我们若从工业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学术写作，会很有帮助，也让我们去思考这之中涉及的劳动力，像是结构组成、工资、劳动条件、技术、资源、监督、自主。

写作当然是一种专门化的劳动形式，特别是一种沟通工作，所以也可以从沟通社会学来看。这让我们去思考读者的面向，怎么接触到读者，写作对读者意味着什么。很重要的一点，研究者必须要想是写给谁看的，这决定的写作本身。

学术研究写作是一种特别的沟通形式，这点也很重掉，因为写作是知识生产集体过程的一部分，所以也可以从知识分子和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该领域在后殖民时期被重新塑造了）。作者和之前与未来知识生产者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并且知识与认识架构也很重要。

有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可以不用把写作看成是迷般的东西，而是一种劳动过程。不同的体裁有不同的读者和风格。而像其他的劳动形式一样，写作包括了可以学习和精进的技巧，也包括了创意和目的性的元素。

过去12年来，我在许多大学和会议中举办了许多写作工作坊。这不是在教怎么写好文章发表

到好的期刊。恰恰相反！我就是要传达上述所说的，写作是一种社会、合作的过程，而且写作是整个知识生产的核心。

> 研究写作的简短纲要

在过去几个月以来，我从工作坊中精炼出一写想法，并在部落格上发表，现在我集结这些文章成册，透过创用 CC 发行电子书。

该书称作《Writing for Research: Advice o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有 42 页（包括图解），可以从网络上下载：<http://www.raewynconnell.net/p/writing-for-research.html>。很欢迎各位下载，传播，都是免费的，没有任何商业目的。

该书讨论写作和体裁，期刊论文写作的实际考虑，个人写作经验，以及写作的政治。目录的大纲如下：

第一部份：关于写作

- 1. 写作的本质
- 2. 研究对话，社会现实
- 3. 研究写作的体裁

第二部份：怎么写期刊文章：实际步骤

摘要；论点大纲；初稿；修改；简报；出版

第三部份：大的图像

- 1. 写作计划
- 2. 为什么写作？值得写作吗？
- 3. 资源

我鼓励其他有经验的研究者也分享其实做和反思，帮助建立更好的理解。最后我也欢迎任何意见和指教。



James Joyce的《尤理希斯》的原稿。

來信寄給 Raewyn Connell <raewyn.connell@sydney.edu.au>

> 介绍哈萨克团队

《全球对话》的哈萨克团队在2015年于Aigul Zabirowa的带领下成立了。这个团队有着坚强的决心将《全球对话》传播到哈萨克的各个角落，并且克服了翻译的挑战。



Aigul Zabirowa 是 L.M. Gumilyov 歐亞國立大學 (Euras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stana) 的社会学系创系主任和教授。她在 Moscow 唸書，2004 年從俄國科學學院的社會學研究所到博士學位，目前的研究包括了哈薩克和吉爾吉斯的家庭的社會經濟狀況。她也是《When Salary is not enough: Private Households in Central Asia》(Verlag, 2015/05) 一書的作者。她教很多课程，涵盖都市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其研究和写作主要是后苏联时代的认同政治，中亚的都市化、迁徙等。其到过许多国际奖项和奖助，像是 MacArthur 基金會 (2000-01, 2002-03)，INTAS (2005-07)，TACIS (2007)，Volkswagen 基金會 (2011-13)，Open Society Institute (2001-03)，Central European 大學 (2001, 2008)，還有哈薩克科學部的獎項。她也曾是在倫敦亞非學院 (英国, 2011)，Lund 大学 (瑞典, 2008)，Warwick 大学 (英国, 2007)，Indiana 大學 (美国, 2002) 等擔任過研究員。她从 2010 年开始是 ISA 的会员。



Bayan Smagambet 是歐亞國立大學社會系的副教授。她在 Almaty 唸書，並且在 1998 年從 Al-Farabi Kazakh 國立大學得到社會學的科學候選人資格。她教授社会学史和经济社会学。其研究兴趣包括了社会不平等，劳动市场。她发表了许多教科书，包括社会学史、经济社会学、社会史，也出版了约 20 篇论文。



Adil Rodionov 是歐亞國立大學的社會系講師。他也是智庫“歐亞整合學院”工作。他在 2009 年获得该校的社会学博士。他曾经在 Central European 大學 (Budapest, 匈牙利, 2013-14) 担任研究员。其研究兴趣在于社会网络、公民社会、社会科学的历史。他现在的计划主要是探讨哈萨克非营利组织的网络，其计划的简介位于：http://e-evaluation.kz/social_capital_en.html



Gani Madi 是歐亞國立大學的社會系教師，並且也在 2010 年于该校獲得碩士學位。他教授理論社會學、結構和階層社會、經濟社會學、精英、遷徙社會學、社會學導論。他現在對於工作場所的權力動態和勞動的管理控制，以及馬克思理論有興趣。